

达旺·达克回忆西藏
《西藏口述历史计划》记录
2014年1月2日，印度白拉库佩

我生于卫藏（今西藏自治区中部及西部）的潘波峡谷，高山和农田上有许多动物。我在四兄弟姐妹中，排行第一。我的童年无忧无虑，平日在地上和河流嬉戏耍乐。我家既务农，又放牧。我们在农田种大麦、小麦、豌豆、芥末、马铃薯和小萝卜。小孩子要放牧，约十岁时放山羊、绵羊和乳牛，大概十五岁时就到远处放牦牛。

小僧侣的生活

我十一岁时出家为僧。根据村里的传统，每户务必有一位僧侣，因为这可以壮大家族声威，好让一家之主掌控它。一家之主必须敬仰一位僧侣，所以家族里有一位成员要在年轻时出家，以获得家人信任。这是我村的习俗。

我们是在农村生活的小孩，我们乐意出家为僧。家里的孩子有很多家务，如放猪、牛、乳牛、山羊和绵羊，还要干农活，工作很辛苦。大家认为当僧侣有读书认字的机会，过得更愉快。故此，我很开心能成为僧侣。众多僧侣住在一起，只有佛门法规，没有针对个人的规条，令人轻松和快乐。随着小僧侣日渐长大，研修的经文越来越多，他们要负责奉茶和其他工作。

我学会了吹号角和竖笛，一吹便吹了十二年。十二年为一代，十二年后，由新一代接手自己的工作，所以我们在第十年开始培养新人。我们有号角手和竖笛手各八十名，乐手一定要吃得健康。在西藏，这意味他们要吃大量肉制食物、牛油和软奶酪。以前的人说吹奏乐曲令身体变弱，所以乐手要持续吹奏乐器，便要吃得好，保持身体健康。

乐器用于宗教仪式中伴奏，除宗教用途外，我们不得随意吹奏乐器。数百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已吹奏号角，号角在西藏很流行。在早年的西藏，号角用于西藏政府指定的演出。除此以外，号角只用于寺院册封喇嘛和活佛（转世喇嘛）的仪式、喇嘛和活佛的毕业典礼或达赖喇嘛尊者主持的祈祷大会。

1959年3月拉萨的示威

我在色拉寺当了僧侣大概十五年，当中担任了许多职位。1959年，西藏出现巨变，当时我在色拉寺。在拉萨遭受攻击前，寺里的事情如常。我们继续研习经文，一切和平如昔。那时中国人没有来到寺庙，但他们已经到达拉萨。拉萨的三大寺一色拉寺、哲蚌寺和甘丹寺，均建于拉萨市郊的山上，中国人不会来。

1959年，默朗木祈愿大法会在拉萨圆满结束，达赖喇嘛尊者在三大寺主持佛教哲学博士的考试。中国人却称为了庆祝大法会，他们希望邀请尊者到他们的大本营出席宴会，可是尊者只能带少量随从，更不能携带武器。

接着，我留在拉萨。所有人，包括我们，都前往罗布林卡。那里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宫殿。尊者的保镖主管明白，如果没有保镖能出席宴会，尊者会非常危险。他对群众说：「聚集在罗布林卡的老百姓，由你们来决定，应否容许中国人押送尊者！」老百姓举起双手，强烈回应道：「我们不许尊者被押走！」

数以万计的民众在罗布林卡正门外徘徊，他们显得很不满。西藏政府与贵族在罗布林卡召开会议，精明的百姓知道政府内有哪些贵族是中国人的内应，会议结束后，那些贵族被群众掷石和殴打。他们遍体鳞伤，被送上摩托车或汽车，送回他们位于拉萨的住所。

罗布林卡的志愿军

我们一行五人，全都自愿留守罗布林卡。我们决定拒绝中国人对达赖喇嘛尊者的邀请，并于门外静坐。由于我们远道而来，我们没有容身之所，在门外睡了三个晚上。我不穿僧袍，我穿上正常的衣服，并在袖子里藏了一把小刀。我们五人只有一把小枪和十六发子弹。两天后，西藏政府每四人分发一枝英国制短管枪。这不足以抵抗外敌，我们威胁政府，若他们不提供武器，便会攻击他们的武器库。后来政府应我们要求，每一组获发一挺机关枪，每人配有一枝英国制短管枪和四十发子弹，我们还有一箱一千发猎枪弹。

三位隶属札基军区的西藏军人教我们拆枪和组枪。那时候我们全是僧侣，军人训练我们开枪。我们已经没有时间考虑这是否违背僧侣的誓言，这事关乎生死存亡。要是尊者被中国人捉走，我们就要准备放弃我们誓言。从此我不再对誓言有任何想法，因为我心里很畏惧。我已有心理准备为达赖喇嘛尊者牺牲，因为我出家时是对尊者发誓的，我是握着尊者的双手发誓的。当有人说中国人打算带走尊者时，我已有牺牲自己的准备。

中国人在晚上发动攻击。我们在罗布林卡里的人全被分到四道闸门应战，我被指派到南门。一批人在罗布林卡里面，他们站在围墙上的看台；另一批人在掘战壕后便到外面去。我们要轮班，当一批人留守在里面，另一批人便要外面把守。当我们在战壕内驻守时，我们恶意拉扯电线，并破坏桥上木板。可是，第二天备有坦克和枪械的中国大军压境。他们修理电线，还在桥上铺设新木板。我们在晚上破坏设施，他们却在日间无惧地攻进来。

炮轰拉萨

我们于战壕内坚守了罗布林卡约一星期。有一天晚上，上级命令所有人留守在内。我奇怪为何有这指令，但是我没有多加注意。三天过去，一切回复正常一两批人轮班，一批人在外面把守，另一批人则在里面驻扎。

再三天后，凌晨二时左右，我们听到机关枪的声音。枪声越来越大，中国军队的炮弹不断从天而降。罗布林卡的保安部队也发炮还击，并向中国宣战，炮弹声此起彼落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到四周视察。炮弹摧毁了罗布林卡内所有美丽的树木，到处都是炮弹的痕迹。我们所在的围墙已被夷为平地，地上只剩下大型弹坑。我们死伤枕藉，大部分同伴死去。同样地，也有老百姓失去性命。没有人冒险外出，因为身旁会有人大喊：「给我水……」，也有人在移动尸体或残肢，实在太震撼了。没有人会出去，因为眼前景象令人忧郁。

到了早上八时左右，布达拉宫被炮轰。虽然罗布林卡的战斗已经结束，但中国军队的炮击依旧不断，西藏人已经无力还击。许多人路过罗布林卡，他们告诉我们达赖喇嘛尊者已被护送前往印度了。我估计经过三天时间，尊者已被护送了一段距离，他应该接近印度边界了。我喜出望外，我想：「只要尊者能被安全护送离开，我死而无憾。」我真的感到非常高兴。

逃往印度

当天晚上，我们开始逃亡。我从罗布林卡出发，身上没有粮食，只有一把枪和四十发子弹。正当我们在路上行走，中国军人不断射杀平民。托佛祖的福，我们侥幸生还。我们

在枪林弹雨之中逃到一片沼泽地。每一次炮弹落在沼泽地，泛起的泥土升上半空，足以淹没任何人。

我回到色拉寺。寺内环境很难让人居住—那里近乎空无一人。总的来说，寺内所有僧侣全都派往拉萨不同地方。有些人被派到山上当守卫，有些人被派到罗布林卡，也有些人被派到布达拉宫。他们全都去了布达拉宫，到政府的武器库拿枪。除了几位小孩外，其他人都离开了寺院。

大家都认为我们应该走出去，由边界开始抵抗外敌，所以我从寺院来到潘波。在那里，中国的轰炸机不停穿梭，我们所到之处均被轰炸。我加入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，与其游击队并肩作战，我们且战且退，最终到达印度。

来到印度后，我加入印度军队。从军的时候，每到就寝时间，我老想着胜利、败仗和杀人，想一想便天亮了。这是军人的职责，但这违背我出家时的誓言。一位正式的僧侣有 223 道誓言，杀戮并不符合任何一道誓言。我很忧郁，我是军人，而作为军人免不了想着杀戮之事。我惟有放弃当僧侣。